

20 | 读·党史 第20辑



邓小平 南方谈话前后

陈 雷/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
南方谈话前后

20 | 读·党史
第20辑



邓小平 南方谈话前后

陈雷/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陈雷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5
(读·党史)

ISBN 978-7-5098-2620-1

I. ①邓… II. ①陈… III. ①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A849. 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6616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196)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鹏

复 审:吴 江

终 审:赵建忠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h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15 千字

印 张: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620-1

定 价:1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录

CONTENTS

▶ 综 述

- 1 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中国新的发展阶段
/陈涛

▶ 回 忆

- 4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回顾/陈锦华
- 12 关广富谈邓小平南方之行第一站
/田晓杏
- 14 邓小平1992年视察珠海特区 /梁广大
- 29 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 /李灏
- 61 邓小平南方谈话报道追忆
/吴松营 陈锡添
- 67 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追记/冯春
- 75 “皇甫平”交锋与1991年邓小平视察
上海/周瑞金
- 92 回忆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
/陈开枝 陈建华 姚欣耀

CONTENTS

▶ 人 物

111 邓小平在1992年 / 韩亚光

▶ 访 谈

43 在小平指导下编《邓选》
/ 郑必坚 龚育之 逢先知

139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 / 吴敬琏

▶ 日 志

105 邓小平南方之行日志 / 万海

▶ 书 摘

39 邓小平南方谈话解读

120 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

▶ 专 论

87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 宋福范

128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四个嘱托 / 陶文昭

▶ 漫 笔

148 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
精神——读《朱镕基讲话实录》几篇讲话的
体会 / 王春玺 张辰

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中国新的发展阶段 / 陈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

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这样，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



深圳街头的邓小平画像

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
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
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
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
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
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
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包括当今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
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
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
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 发展自

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
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经济
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
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
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 必须反对腐败, 廉政
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
情能不能办好, 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
键在人, 说到底, 关键是我们共产
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
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
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 社

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过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回顾

／陈锦华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件大事，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一个是90年代中期面对经济过热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我1990年至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主任，1993年至1998年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直接参与了这两件大事的研究和相关实施工作。现将有关情况作一回顾。

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

向，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意见。江泽民同志到中央主持工作后，这是他当时面对的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经济学家当面争论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这件事不仅学术界、理论界认识很不一致，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认识也不一致。有这样的意见，也有那样的意见，不同意见之间怎么取舍？这对江泽民同志是个很大的挑战。记得他跟我说过：各方面的意见我都听，最后还要听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总得有个决断嘛。邓小平同志一直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而不是区别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但由于大家认识不一致，邓小平同志在这个事情上也很慎重，注意不把步骤搞得太快，弯子转得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难。他曾经找我聊过，谈到苏联失败的教训，也谈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苏联的那一套东西证明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应该改变。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势头不错，他是肯定的，但他对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的负面影响很注意，对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良苗头也很警惕，总想找到一个比较健康和恰当的模式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江泽民同志非常注意了解国内外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情况，认真吸收好的建议。1990年，我到体改委工作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直接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为了搞清情况，便于进一步研究问题，我布置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整理了一个材料，反映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由来已久的争论和现在对这个

问题的看法，题目叫《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评论》。这个材料讲得很清楚，20世纪初就已经有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起源于对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那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有了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只是到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调整的时期，这个争论才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了。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体改委本身也有不同看法，主要还是有顾虑。1990年12月初我把这个材料送给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江泽民同志收到这个材料以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材料他看了两遍，觉得很好，能看清楚问题，并印发中央有关同志了。由此可见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是一个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当时不好轻易表态，他就尽量通过个别交谈、开座谈会、印发研究材料等办法来推进这件事，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做提高认识和统一思想的工作。这样一步一步取得大家的理解和

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给江泽民同志准备过一个材料。1992年“两会”期间，一天晚上11点多，江泽民同志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很不一致，将来究竟怎么搞好，大家还在等待，看中央是一个什么态度，这件事情不能老等啊，你们体改委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出建议。我想光体改委自己研究还不行，于是就找了广东、江苏、四川、辽宁、山东五个有不同代表性的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范围很小，不带助手。当时没讲是江泽民同志要我们研究这个事，而是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对外注意保密。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是政府机构改革问题，重点是谈前面一个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我于4月21日给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大家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方法，应当也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

同时附上了两个材料。一个材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篇书面讲话稿。在同五个省体改委主任座谈前，我们召开了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找了很多外国专家，也邀请了基辛格。基辛格给我写了封信，附上他的书面发言。我觉得他讲的还是客观的，没有什么政治化的东西，而且他强调各国情况不同，各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认为可以参鉴，于是在送江泽民同志关于经济改革的材料时，就附上了基辛格这封信。另一个材料是五省的经济的发展对比数据，说明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发展差距。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后，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水到渠成了。在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在起草组第一次会议上就强调，要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来贯穿全篇报告。南方谈话中对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在那个讲话中，关于经济体制他讲了几种提法，并且说：“我个人的看



《解放军画报》登载的中共十四大图片新闻报道

事情，只要是好的、有用的，很快就推广，充满活力。我感觉江泽民同志是借恩格斯的话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但他没有把这个意思点穿，而是借学习经典著作来提高

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既是探讨，又是表态。江泽民同志掌握得比较巧妙。那次讲话后，他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表示赞成，并说把这个事定下来，十四大报告就有了主题了。十四大报告就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调来写的。

十四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江泽民同志推荐我们起草小组的同志看看恩格斯访问美国后写的一篇文章。大家都看了。恩格斯对美国接受新事物快和效率高很赞赏，认为不管什么

认识，统一思想。

从江泽民同志到中央主持工作至1992年，也就是三年的时间，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在全党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这是很不容易的。这里有一个细致稳妥地进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工作过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那就很可能会增加解决这个问题阻力。

对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上也有不同看法，有反对的声音。江泽民同志跟我讲过，他和撒切尔夫人就争论过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江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要按我们自己这个路子走,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

关于90年代中期国家通过实施和加强宏观调控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各地都要求加快发展。希望加快发展,符合小平同志谈话和中央的精神。但是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不少地方不从具体实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越搞越热,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物价上涨,群众反映强烈。面对这样的形势,要不要采取措施?如果采取措施,会不会影响大家发展经

济的积极性?这些都是摆在大家面前需要考虑的很现实的问题。当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你还搞什么宏观调控,搞宏观调控就是不重视市场作用。这也是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回答的问题。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是比较全面的。对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他讲得很清楚,既要积极又要全面地来领会和贯彻,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现实可能,坚持实事求是,要注意我们在历史上走过弯路的经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含义,江泽民同志在一个讲话中讲得很清楚。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是多余的,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这个讲话非常好,充分体现了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当时在改革问题上有一种观点,就是

有的人极力推崇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搞绝对的市场化，好像一搞政府干预，一搞国家的宏观调控，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江泽民同志讲“画龙点睛”，点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就是说我们在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通过采取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要求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指导和调控，以弥补和纠正市场的缺陷，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否定了那些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片面性的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

江泽民同志是懂经济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江泽民同志有过在上海当市长的经历，这对他观察经济形势、发现和解决经济中的问题很有好处。对于经济过热，江泽民同志是比较敏感的。我记得早在1992年底叶利钦访华时，在宴请叶利钦后，江泽民同志跟我讲，他觉得目前经济已经有些过热

了，下午开会要讲讲经济过热的问题。我表示赞成，认为是讲话的时候了。此后一段时间，他不断地讲这个问题。

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究竟怎么看？上上下下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同志感觉是过热了，特别是中央的一些综合部门，像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呼声很高。有些同志，包括一些发展快的东部地区的同志，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现在发展势头很好，可以再快一点，小平同志不是讲“发展是硬道理”吗，那就应该加快发展，不然要丧失机遇。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同志也有他们的看法，认为我们这里本来发展就慢，刚要加快发展你就说热了。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你热我不热”。在这样的情况下，统一全党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制订政策的前提。我印象中，1992年那一年，江泽民同志曾多次讲，不断地讲要防止经济过热这件事。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开“两会”以前讲，“两会”后又把书记、省长留下来讲，4月初到日本访问前，又

写信给邹家华同志，说这个问题弄不好要酿成大祸。他还不断让我们提供数据，让各地领导重视。我认为正是由于他冷静地思考和及时地采取步骤，同大家打招呼，商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才慢慢认识到，固定资产投资那么高，乱拆借、乱集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特别是通货膨胀，物价过快上涨，越来越严重地扭曲了经济生活，问题确实很严重，经济确实过热了。于是先是国务院下文件，制止乱集资、乱拆借，清理开发区，最后中央下文件，有了1993年提出的著名的“十六条”。

“十六条”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搞的。起初是一步一步采取措施，但制止不住经济过热。如果此前已经见效，也就不需要发这个文件了。1992年全国计划会议就开始强调加强宏观调控，1993年3月开书记、省长会讲防止经济过热，4月国务院发文件，制止乱集资、乱拆借，强调加强债券管理。到5月国务院又发文件，清理开发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但所有这些，

都未能收到明显成效。国务院派工作组下去考察，回来汇报说，问题还在发展。这样才不得不搞“十六条”。最初这个文件想叫《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稳定经济的决定》，后来考虑，“决定”这个词重了一点，又考虑过叫“通知”，但又感觉轻了一点，最后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文件下发后，又组织了七个工作组，都是正部长带队，到各地检查落实。银行、财政也分别开会，朱镕基同志讲了两个“约法三章”，限期收回不合理拆借资金，搞釜底抽薪，时间是8月15日，叫“八月十五月光明”。采取这些果断的硬性措施，这才逐渐把通货膨胀止住了。

从这个过程看，江泽民同志对这件事的认识和抓这件事的方法，都是正确的。那一时期，江泽民同志抓经济，主要是抓政治领导，抓领导干部的认识，而不是从个别地方、指标、项目着手，从而保证了全党认识的统一，保证了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保证了经济“软着



陈锦华

座谈会。我分析，那个时候如果集中在一起开会，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就很难办。分别开会，好做工作。那一段江泽民同志不容易啊！我们这么大个党，

陆”的成功。

有一次我跟曾培炎同志说起这件事，我说江泽民同志是懂得领导经济的艺术的。要是中央直接抓项目、抓指标，那是不可能抓好的，中央就是要抓思想、抓认识，保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统一高层认识，同时采取果断的措施，效果就很明显。

“十六条”出来以后，国家计委曾建议中央就贯彻“十六条”的问题开个会，进一步统一认识。江泽民同志考虑并和李鹏、朱镕基同志商量后，决定不集中开会，而是分别座谈。1993年，江泽民同志分片召开了华东、西北、东北的经济

既要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又要保证党的团结，就要讲工作方法、工作技巧。如果在一个很大的会上讲了意见，不同意的人多，就只好办。国家这么大，地区发展的差别又这么大，要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让全党认识一致，确实很难。通过分片讲，再通过简报、中办通报发出去，认识就逐步统一起来了。

在经济“软着陆”成功前后，我曾到英国、法国访问，和它们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会谈，相互介绍情况，他们都非常赞赏中国的“软着陆”。我介绍说，中国的“软着陆”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同时也辅以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

我们党中央直接过问这件事情，总书记直接找省委书记做工作。他们很欣赏，说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做不到。

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情况千差万别，事情要做得很圆满、很到位，不容易。我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最到位的。对比我们以前搞的几次调整，包括改革开放后的治理整顿，可以说这次调控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经验，使中国经济一步一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现在这个好的局面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全世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最好的是中国，我们不仅稳住了自己的经济发展，还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支持了亚洲和世界经济复苏，了不得啊！从那以后中国的形势就更好了，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引导中国经济继续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再一次引起全球的热烈关注和积极评价。

（选自《党的文献》

2008年第4期）

关广富谈邓小平南方之行第一站 / 田晓杏

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关广富曾深情地回顾了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第一站的情形。时任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对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铭记

在心。

他说：“1992年元月，中央通知，小平同志南下18日路过武汉。我们几个书记商量，要看看他老人家。经请示同意，我们去了武昌火